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演变研究(1947—1953)

滕一江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二战后,随着新的国际形势发展,东南亚华侨华人骤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生存现实。新加坡华侨郑武昌与其在潮安老家的未婚妻蔡丽惜的一封封批信中,便诉说着在出入境管理政策收缩的背景下,二者不能相见之苦。1947—1953年,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控日益严苛,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利益的维护,东南亚地区排华浪潮的影响,美国对新中国的怀疑与敌视,新加坡内部住房资源紧张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了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收缩,并对华侨华人个体与新加坡社会带来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 新加坡华侨华人; 出入境政策; 华人移民

[中图分类号] D634.3.3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925(2022)03-0043-08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日益紧密。近年来,学界掀起了关于海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史研究的热潮,涌现了一批相当显著的研究成果。东南亚各国的移民政策研究是华侨华人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华侨华人迁居他国,首要考虑的就是他国移民政策,而各国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部分,紧密牵动着无数华侨华人的日常生产与生活。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各方势力交叉渗透的东南亚地区,一项政策的演变往往与多方利益相关。“华侨问题不仅与少数民族裔、民族同化、排华反华等主题密切相关,它还涉及当事国之间以及当事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冷战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①结合历史上的国际形势进行研究,是分析该时段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演变原因的关键所在。

战后,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新加坡处于英国、美国与马来亚共产党多方势力斡旋的中心,受到了各方学者的关注。孟庆梓从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历史变迁、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等八个方面梳理了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内学界对新加坡华侨华人的研究成果^②,对学界进一步充实新加坡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学者研究视角的取舍不同,目前学界对于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研究散见于相关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著作与论文中:黄英湖在《战后华人新移民问题初探》一文中,对欧美、东南亚的华人移民政策变化及影响进行了初步的分析^③,对后续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性意义;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广州华侨研究会共同出版的《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一书认为,东南亚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中国大陆解放是导致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收缩的原因^④,该观点具有合理性,但仅着眼

[收稿日期] 2022-04-03; **[修回日期]** 2022-04-11

[作者简介] 滕一江,广西柳州人,暨南大学文学院中外关系研究所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华侨华人史。

^①刘雄,尹新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南亚华侨问题与美国对华遏制政策》,《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②孟庆梓:《近30年来中国学界新加坡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综述》,《八桂侨刊》2008年第1期。

^③黄英湖:《战后华人新移民问题初探》,《八桂侨史》1992年第3期。

^④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广东华侨研究会编著:《战后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华人政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2页。

于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双边关系,未深入探究导致该政策收缩背后的多边关系,分析略显片面;廖小健的《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一书对战后新加坡的华侨华人政策进行了简短的介绍^①,但其内容以通史为主,未对政策的演变原因作深入剖析;温广益主编的《“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一书将该政策的演变作为新加坡华人争取新加坡国籍与公民权的原因之一^②;薛君度、曹云华主编的《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③与庄国土等著的《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变化》^④皆将该政策的收缩作为研究新加坡华侨华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背景。

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多将 20 世纪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的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的演变作为华侨华人社会转型、华侨华人政治与经济背景或注脚,内容偏重介绍而轻于分析,篇幅较为短小,对左右该政策制定的多重原因缺乏整体性研究,亦未充分关照该政策的收缩对于华侨华人个体及其家庭的影响。鉴于此,本文采用新史料与新视角,以广东省档案馆于 2021 年底公布的第三批侨批档案作为切入点,梳理 1947—1953 年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的演变过程,将该政策放在历史与国际关系的视角下进行综合考察,系统地探析该政策在内外形势变动的共振下进行演变的多重原因,将个体微观角度与社会宏观角度相结合,以期更为全面地看待该管理政策收缩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推动我们对这一时期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理解与新加坡华侨华人历史生存处境的认识。

一、新加坡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的演变

1955—1956 年,旅居新加坡的华侨郑武昌给远在潮州潮安老家的未婚妻蔡丽惜寄去了一封封批信,并附上工作所得的些许钱款。其中,郑武昌在 1955 年元月四日寄给蔡丽惜的侨批中写道:

……自从订婚之后,愿望早日回归,完却此事,谁料屡次发生枝节,以致一延二载有余,甚为遗憾……而目前当地政府对归侨管制甚严,为欲回归,必须申请签证,方得回归……自从去年前往申请,不见回复,一再询问,惟言候待调查,因此进退两难,有为归后不能来叻星,那时对于经济生活定必困难,伏乞妹汝详察,候吾设法取的签证之后,火速回归。^⑤

从信件内容来看,郑武昌与蔡丽惜早已订婚,郑武昌自 1952 年便着手办理华侨回国所需的签证,欲回潮安与蔡丽惜完婚,但受到当地政府对归侨出境管制的影响,郑武昌直至 1955 年都未获得新加坡移民厅颁发的回国签证。另一方面,郑武昌亦考虑到回国后不能返新的可能:“因本地政府对归侨回国,不欲发给签证手续,归后不能再返……惟是长住之计,恐难维持。”^⑥郑武昌担心倘若无法返新,一家人的生计便难以维持,于是只能将自己出境回国的计划作罢。

郑武昌既然以华侨身份归国无望,便转而打算让未婚妻蔡丽惜移民入境新加坡。郑武昌为此多次前往新加坡移民厅,并且花费高昂的人情费用为蔡丽惜办理入口证,但移民厅却以二者尚未结婚为由,拒绝颁发入口证:“入口证一事尚未完妥,此事实是最为令人愤恨……彼言在十二月当可完妥手续,余闻之甚为欢慰。岂料及后因查出汝吾尚未结婚,不能为愿”^⑦“……因汝吾未结婚,前往申请被政府人员诸多留难,目前由人色办花去银项甚多……”^⑧至此,蔡丽惜以郑武昌未婚妻的身份移民新加坡的计划也失败了。

20 世纪 50 年代前期,郑武昌无法从新加坡出境回国,其未婚妻蔡丽惜亦无法移民入境新加坡,实质上反映的是当时新加坡华侨群体无法返回祖国,华侨华人亦无法从祖国入境新加坡的窘境。1947 年 9 月,英

①廖小健:《战后各国华侨华人政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 92—94 页。

②温广益主编:《“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62—66 页。

③薛君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第 147—148 页。

④庄国土、杨仁飞等合著:《二战以后东南亚华族社会地位变化》,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58 页。

⑤《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5 年元月,广东省档案馆藏,《侨批档案(第三批)》第 197-012-00638 号。

⑥《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 年 9 月,第 197-012-00700 号。

⑦《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 年 2 月,第 197-012-00646 号。

⑧《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 年 4 月,第 197-012-00710 号。

国殖民政府曾在新加坡颁布《新加坡入境新条例》：“规定凡申请作为移民亲属入境者，仅限于以下4种身份：(1)曾在马来亚居留的侨民；(2)在新加坡的侨民的妻子或未婚妻；(3)在新加坡的侨民的未成年子女；(4)在新加坡的侨民的高龄父母。”^①按此条例，1947年末蔡丽惜完全可以凭移民亲属的身份入境新加坡，但短短几年内，新加坡政府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管理政策却急剧地收缩，对当时华侨华人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1948年，新加坡为英国皇家直属殖民地，与马来亚联合邦在同一殖民体系下实行分治。1948年3月，新加坡连姓华侨仍可回到祖国，在江浙一带进行自由参观访问，并于5月中旬顺利返回新加坡，期间还在《南洋商报》上连载两则《祖国行纪》^②。可见英殖民政府接管新马时，华侨的出入境及其活动并未受到太大影响。1948年6月，马共发动武装斗争活动，以此反对英殖民者，其斗争行动遭到了英方的强力镇压，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马来亚联合邦进入紧急状态，几天后，该紧急状态扩展至新加坡。

新加坡华侨华人首当其冲地受到了镇压马共的影响。1948年下半年始，紧急状态下的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逐渐严密，增加了一系列对华侨华人出入境限制措施：大幅增加外侨入境费，手续费由原来的五元增至二十元，直接增加了三倍的费用负担^③；对华侨眷属入口准证从严办理，使得侨眷移民入境十分困难^④；压缩华侨居留证时限，外侨须持居留证出境回国，英人回国时长可达六个月，而华侨只有三个月，居留证一旦过期，便被拒绝入境^⑤。短时期内，多种针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管控措施齐发，无不显示出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的苛刻待遇，这类行径引起了新加坡华侨强烈的愤懑：

……如所周知，本坡移民厅所采取之行动，类似一种重压手段……现在当局一面宣称民主政治与各民族平等自由，一方面对华人加以歧视，当局将何以自圆其说？^⑥

但新加坡当局无视华侨华人群体的利益诉求，继续收紧针对华侨华人的出入境管理政策。1950年10月，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联合发表《星马护照（修正）条例》：“凡属当地外侨，于离马后欲重返马来亚与新加坡，除持有效之入境证外，尚须获有返马之签证。每一签证收费叻币七元。”^⑦之前华侨华人出入境仅使用居留证，凡持有居留证者，因经商、旅行、探亲等原因离开新马，都可返回，无须办理其他手续。新加坡移民厅在华侨居留证时限上的压缩，尚且给华侨出境带来不便，而新推行的“入境（口）证”“回境签证”无疑给华侨往返两地造成了更大的困难。1952年11月，新加坡移民局局长赫斯华氏在记者招待会中宣布，新加坡将实施新移民统制法，并明确指出，该法案主要针对占新加坡人口绝对多数的华侨：“但在本坡出生或在本坡归化之英籍民，则未受此将实施之新移民统制法令所影响。”^⑧该法案重新宣布了能够移民入境的华人类型：“……而能申请来星者，亦只限于对本坡经济，工商业，社会福利工作（大体属于教会中人）及教育有关人士。”^⑨但移民局对“有关人士”的界定语焉不详，在移民厅制定的模糊标准下，华人移民基本都难以符合所谓的“有关人士”标准。1953年8月，该新移民统制法案生效，华侨华人出入境受严厉限制，离境一年者将不准入境新加坡，并严禁外侨赴中国大陆，如擅自前往中国大陆，返回新加坡时将遭到当局扣押^⑩。

二、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收缩的原因

1947年，新加坡籍华人总数达729.5万，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7.8%，为新加坡人口的主体民族^⑪。而英殖

①周南京：《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25页。

②[新]《祖国行纪》，《南洋商报》1948年5月26日，第3版。

③[新]《反对增加入境费》，《南洋商报》1949年5月7日，第1版。

④[新]《吁请当局宽放华侨眷属入境》，《南洋商报》1949年6月22日，第1版。

⑤⑥[新]《居留证问题》，《南洋商报》1949年8月24日，第1版。

⑦[新]《移民统制法令草案在宪报公布》，《南洋商报》1950年10月3日，第5版。

⑧⑨[新]《本坡将继续联合邦后实施新移民法令严格管制外侨移民入境》，《星洲日报》1952年11月27日，第5版。

⑩温广益主编：《“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第63页。

⑪陈列：《浅谈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结构的变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民统治下的新加坡政府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管理却逐渐严苛,近乎“一刀切”的政策不仅冲击着新加坡的华侨社会,更冲击着主要由华侨华人所支撑着的新加坡经济。但英殖民政府在明知会触犯新加坡整体社会利益的情况下,仍旧选择了对华侨华人出入境严加管控,其背后有着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一)英国为保持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

二战后,英国根据战时制定的计划重组马来亚联邦,但因遭到苏丹和马来人的反对而失败。1948年2月,英殖民政府宣布成立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仍为英国皇家直属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宪制偏袒马来人的利益,遭到了除保守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之外的政治力量的一致反对,马共乘机发动武装斗争,新马工人运动亦蓬勃展开,冲击着英殖民统治。在马来亚政局动荡的情况下,英方在新马两地颁布“紧急法令”,对马共和相关革命政党进行大肆逮捕。

马共的斗争直接导致了新马两地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的急剧转变。一方面,马共里华人占了大多数;另一方面,马共由于遭到镇压,其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或农村,利益受损的华侨华人对马共抱有同情:“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华人最容易接受马共的宣传,他们给游击队提供食物、情报和招募成员。”^① 华人对马共的帮助,乃至有部分华人加入马共进行反英运动,为英殖民者所不容。英殖民政府为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殖民利益,对殖民地上的华侨华人进行严密的控制,限制华侨华人的出入境活动便是其手段之一,主要目的在于切断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防止马共对英殖民政府更大的威胁。

英国殖民政府为了对抗马共,采取了“宁杀错,不放过”的政策,将住在新马乡区、森林边缘及郊区的华人,都当作是马共的支持者,甚至曾想将50万名华人遣送回中国^②。但由于英殖民政府无此经济实力,且在新的国内外形势变动下,英国殖民政府只得选择将华侨华人就地留困,严密管制其出入境。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方对新马华人的遣返更加难以进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马来亚地区的橡胶业与锡矿业出口额大涨,至1950年底,橡胶的出口值已是战前的3倍,锡矿产量也远超出战前水平。外汇收入也从1948年的5.19亿美元迅速增至1950年的11.95亿美元^③。新加坡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转口贸易与金融服务,由于转口贸易利润丰厚,英国殖民者在新加坡极力扶植转口贸易:“新加坡以马来半岛等地盛产的锡、橡胶等为主要的转口商品,因此,炼锡和橡胶加工业在新加坡发展迅速……1950年,新加坡锡和橡胶的出口占53.29%。”^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内经济亟待恢复发展,因而英国政府大力扶植海外殖民地经济发展为国内提供资本。据统计,在战后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就业总人口中,马来亚联合邦华侨华人有49.34%从事第一产业,18.6%从事第二产业,32.6%从事第三产业^⑤,其中从事职业的榜首为橡胶种植业。新加坡华侨华人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9.47%,从事第二产业占22.72%,从事第三产业占67.81%^⑥。由华工作为主要劳动力的锡胶业不仅是新加坡转口贸易的命脉,更成为英殖民政府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欢欣鼓舞,不少人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尤其是东南亚华人掀起了一股回国热潮,为保障劳动力的供应持续稳定,英国殖民政府在新、马两地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侨华人出境的管制。

英殖民者在东南亚地区为了维护殖民地利益,一方面要保有自身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地位与绝对话语权,在地理空间上对华侨华人与祖国进行强制切割,防止二者相互联系而推动当地的反殖民运动;另一

①李粉玲:《1930年—1957年间马来亚共产党的主要活动》,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23页。

②庞卫东:《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研究:1945—196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③D.G.E.霍尔:《东南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39页。

④田兴利:《新加坡产业结构调整研究(1959—1996)》,云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21页。

⑤该数据根据M. V. Del. Tufo, *Malaya: A Report on the 1947 Census of Population*, London, 1949, Table 78 计算。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加工业、制造业;第三产业包括商业、金融业、建筑服务业等。

⑥林远辉、张应龙:《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487页。

方面要维护自己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利益,在“紧急状态”下严格限制新马两地的华侨华人流出,保证以华工为主的人力资源整体规模,维护东南亚地区锡胶业的生产、出口,从而获得高昂的美元收入。于是,新加坡作为华人人口为主要的城市 and 大型转口贸易的中心,英国殖民政府不得不在此推行和马来亚联合邦一样严苛的限制华侨华人出入境的政策。

(二) 东南亚地区的排华与恐共浪潮交织

二战后,东南亚地区逐渐掀起了排华浪潮,而欧美国家在东南亚地区的反华、恐共宣传,使得东南亚地区的排华浪潮与恐共心理相互交织。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在几年时间内迅速严密,是东南亚地区对华侨华人的排斥态度的体现,也是美国对新中国敌视的结果。

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东南亚各民族国家,为了自己族群的尊严和荣誉,为了洗刷殖民地时代的屈辱,他们在战后纷纷要建立自己的种族支配地位……原住民群体建构种族支配地位的愿望与华人在经济上尤其是私人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形成冲突,在这种情境下,华人必然遭到排斥。”^①当时的马来亚、越南、印尼多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排华事件,排华情绪在东南亚地区逐渐蔓延。华人在经济领域上的优越地位,与新加坡争取民族独立的需求相冲突,新加坡移民厅长就曾高调宣布,实施新移民法的目的就在于控制外侨入境,培养新加坡人才,令新加坡人担负起新加坡的重要职务,从事专门职业,从而维护新加坡本地人的利益^②。

1948年始,英国殖民政府统治下的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趁势鼓吹“回到中国去”运动^③,一方面驱逐国内的“共党”,其中多数系华人;一方面严厉限制华侨从祖国返新,拒绝华人移民入境,许多华人在新加坡移民厅办理入口证时遭到官员的强硬拒绝:“据称,移民厅官员曾公然告诉若辈申请者,政府不喜欢中国人居留此邦,回中国最好不要重来。”^④

美苏冷战爆发后,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因美国势力的渗透变得更加风云诡谲。冷战初期,美国即关注到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1949年初,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命人起草了《美国对东南亚的政策》,指出东南亚不仅是橡胶、锡矿、石油等重要原料的产地,还是沟通东西、南北半球交通的十字路口,对美国至关重要^⑤。“如果共产主义席卷东南亚,美国必会遭受政治上的大溃退。”^⑥因而美国极力在东南亚地区推进反共宣传,巩固西方阵营,保证他国对美国持友好态度。

新加坡当局对于华侨华人的防备心理与敌视态度,导致对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收缩,《南洋商报》发表了对华侨华人被限制出入境一事的社论:“东南亚的国家主义者,包括此间多数欧籍人民亦认为,中国对于此类小国家,系属于一种潜伏着的威胁。他们深恐一旦英、法、荷撤退,或者中国统一,转变其视线于南方时,华人第五纵队,势将出动。”^⑦直指限制华侨华人入境的措施源于东南亚各国对华人及恐共心理。东南亚地区的排华与恐共两种思想汇合成了一股强大的浪潮,华侨华人在此种浪潮的强势冲击包围下,境况日益艰难。

①王九龙:《战后东南亚排华探究——以马来西亚、印尼为案例的分析》,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页。

②[新]《移民厅长昨招待记者谈新移民法令》,《星洲日报》1953年6月24日,第5版。

③[新]《本年五百余人被驱逐出境华侨处境益难 美联社特约记者指出“回到中国去”之运动正在被采用》,《南洋商报》,1948年10月2日,第5版。

④[新]《居留证问题》,《南洋商报》1949年8月24日,第1版。

⑤张焕萍:《再论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战(1949—1964)》,《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⑥Johannes R.Lombardo:“A Mission of Espionage, Intelligence and Psychological Operations: The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1949—1964”,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London and Portland, 2000. 转引自张焕萍:《再论冷战初期美国对东南亚华人的宣传战(1949—1964)》,《南洋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

⑦[新]《本年五百余人被驱逐出境华侨处境日益艰难,美联社特约记者指出“回到中国去”之运动正在被采用》,《南洋商报》1948年10月2日,第5版。

(三)新加坡内部资源的短缺

新加坡地狭人稠,贫乏的自然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华人移民入境。二战时,日军占领新加坡并采取种族清洗政策,大批华侨被屠杀、贩卖,幸存者多逃难他国,新加坡的经济遭到了极大摧残。1946年,英殖民政府接管新加坡后,便着手恢复饱经摧残的新加坡经济。同时,中国境内国共内战爆发,大批华人为躲避战乱而选择移民,华侨复员亦想返回东南亚地区,新加坡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关措施接收华人移民与复员华侨。1947年1月,新加坡福利部部长宣布:“本机关已在新加坡部署接待及处置此辈遣配返故居之人士,其中包括男子及妇孺,与移民厅商议入境通融办法。”^①当时的英殖民政府为吸纳华侨华人劳动力重建新加坡,对华人移民采取宽松的入境办理政策,“对于证明书之有无,以及在马住址调查并不斤斤计较”^②,对复员华侨则准备了譬如施打疫苗、建立招待所、购买车票等一系列接待措施^③。

随着大批的移民涌入,新加坡面临突出的住房缺乏问题,尤其表现为城市住房问题。新加坡人口拥挤、住房短缺的现象早在20世纪初就出现了,这种情况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移民的大量流入而加剧^④。华人移民有寻亲靠友的传统,华人在当地站稳脚跟后,往往会将一家老小接到居住国,于新加坡而言,这意味着将进一步加剧当地的“屋荒”现象。住房问题直接导致英殖民当局扭转对移民入境的态度,1947年11月,《南洋商报》报道:“现时每月中向移民厅申请入境宗数,虽以数百计,但每月遭拒绝发给入境文件,约占八十巴仙之众。”^⑤早在1948年6月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限制华侨华人出入境前,新加坡当地房屋资源短缺的窘境已然显露:“昨日据移民厅赫斯华氏称,本坡目前房屋仍甚短缺,粮食供应情形复继呈不稳定,故不能即时准许大批移民入境。”^⑥“屋荒”显然是促使新加坡移民厅收紧入境政策,以降低移民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

面对日益严重的“屋荒”,英殖民政府并没有选择“开源”,战后殖民地独立运动的临近,英国殖民政府不愿把大量资金投在新加坡的基础设施上^⑦,因而英殖民政府便只能选择“节流”,控制外来移民入境新加坡:“此项(指新移民法案)有造成一种稳定人口之倾向,而此项稳定,在政府方面认为于其筹划长期之教育,保健及屋宇各般设计上,颇有重要性。”^⑧

三、新加坡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收缩的影响

1947—1953年,新加坡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政策经历了一个急剧收缩的过程,该政策的骤然收缩,对新加坡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政策下至民间,新加坡无数的华侨华人承担着新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本文试从个体与社会两个角度进行考察,以求更全面地看待该政策的实际运行影响。

就个体而言,海外谋生的华侨往往肩负着改善家人生活的重任,他们通过书信与家乡亲友保持联系并汇去钱款,其书信真实地记录了海外华侨的生存境况。侨批的发掘整理和应用有助于我们从底层社会的视角关注普通华侨的移民史以及由此带来的华侨家庭的命运变迁^⑨。以郑武昌侨批为例,可以为我们生动而具体地再现新加坡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管理限制政策对个体的影响。

新加坡对华侨出境的严密控制,以至于郑武昌尚且不能以完婚为由出境,而1953年新加坡移民统制法

①②③[新]《新嘉坡当局对复员华侨入境采取宽大同情策》,《南洋商报》1947年1月17日,第5版。

④宋培军,张秋霞:《居者有其屋:二战后新加坡组屋政策探析》,《世界历史》2016年第2期。

⑤⑥[新]《外侨申请入境者大半遭拒绝,移民厅官员对记者谈不能准许大批移民入境原因》,《南洋商报》1947年11月11日,第2版。

⑦Diane K.Mauzy and R.S.Milne, Singapore Politics Under the People's Action Party, London: Routledge Publishing Press, 2002, p.122.

⑧[新]《当局将加强移民政策,此移民新法案将在立法会议提出》,《南洋商报》1950年2月27日,第5版。

⑨密素敏:《从移民书信看华侨家庭的跨国互动》,《八桂侨刊》2015年第4期。

案的颁布,又使得蔡丽惜入境新加坡再无可能。郑武昌与其友松炎叔商议后,便决定让蔡丽惜与其单身同乡“潮彬老叔”结婚,蔡丽惜与潮彬叔以夫妻名义于马来亚柔佛州另行申请入境:“由松炎叔设法,由潮彬叔之名义往马来联邦进行申请,一来自己乡人;二来潮彬叔与吾感情尚为要好,正能得彼之同意。”^①“因马来联邦政府对于申请入口字,为无婚书及证明书不能接受办理……以惟有假潮彬叔之名字,前往代为申请较有希望,因彼有回唐大字,且星洲移民厅并无存底,前往申请较为容易。”^②郑武昌在侨批中称蔡丽惜为“丽惜吾妹”,可见蔡丽惜的年龄较郑武昌小,而潮彬叔则是与蔡丽惜不同辈分的老人:“内挟影片即潮彬叔”“另者觅一老人与汝同摄一相片,如你家中有这样老人亦可”^③郑武昌与未婚妻蔡丽惜皆受新加坡出入境管理政策的节制,二者为求团圆,蔡丽惜只得选择跟一位陌生老人结婚。从郑武昌多次写信劝说、催促蔡丽惜推断,蔡丽惜应对与潮彬叔结婚一事怀有一定的抵触情绪,但在郑武昌的不断劝说下,蔡丽惜还是将与潮彬叔办理的婚书寄去了新加坡。在这一批郑武昌侨批档案的结尾,蔡丽惜虽与潮彬叔结婚,但因证明书仍未办妥,难以获得马来亚的入口签证。

郑武昌与蔡丽惜的困境,实际上是千千万万个华侨家庭的缩影。华人的家庭观念极深,以家庭团聚为天伦之一大乐事,但华侨华人出入境十分困难,侨眷又难以移民入境与亲人团圆,这不啻于将两个家庭一分为二,只徒增双方劳念而无法团聚。蔡丽惜因数年不得与郑武昌见面,陷入了长期的消极情绪中,郑武昌只得写信相劝:“另者来信言及终日想念,不能与吾会合……想开一点,不要太过悲观。”^④但不久后郑武昌也不得不承认世事多艰,在信中也显露出消极的情绪:“千言万语集于笔下,惟怨命却而已。”^⑤

郑武昌和蔡丽惜因政策收缩导致难以团聚的事件在当时并非孤例。由于该政策给华侨与侨眷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华人参事局议员施佩蓉女士便向新加坡总督金森提出了“华人家属由中国来星入口准证之发给”提案,在其中说道:

现在国内局势不宁,在国内之华人眷属,大都为年老之双亲及妻室与子女,渠等之处境困难,可以想象,并且万一战事蔓延,安全亦将发生问题……国内侨眷,多数籍此间接济其生活,目前汇疑殆将断绝,交通亦日形困难,如渠等之眷属不获淮南来,则生活必将发生问题……

华人参事局的提案陈词,亦切实地反映了出入境管理政策对华侨华人个体及其家庭命运的深远影响。从微观的角度入手,有助于推动对当时新加坡出入境政策的全面理解,勾勒出华侨华人在该政策下的生存处境,构建更为完整的新加坡华侨华人历史。

从社会角度看,该政策的演变给新加坡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崔贵强在《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一书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5 年间,是新马华人在政治上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居住国的时期,而第一阶段(1945—1949),大多数华人仍认同于中国,而不愿认同于居住国;第二阶段(1950—1955)为华人国家认同转向的过渡期;第三阶段(1956—1959),华人基本上转为认同于居住国。学界对新马华人国家认同转变的原因研究已汗牛充栋,多数研究认为新马限制华侨华人出入境的一系列措施是造成其认同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一来,故国归不得,‘归去来兮’已成绝唱,这更加深了华人在当地落地生根,终老于斯的观念。不管是为自己及子孙计,争取成为当地居民,是必然的趋势”^⑥

1953 年,新加坡当局颁布的移民统制法令,严格限制华侨华人赴中共地区:“据氏(新加坡移民统制官

①《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 年 1 月,第 197-012-00646 号。

②《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 年 2 月,第 197-012-00699 号。

③《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 年 1 月,第 197-012-00649 号。

④《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5 年 10 月,第 197-012-00645 号。

⑤《夫郑武昌寄蔡丽惜收侨信(内信)》,1956 年 2 月,第 197-012-00709 号。

⑥薛君度,曹云华主编:《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迁》,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 年,第 158 页。

赫斯华氏)谓,本坡与中国间之往来,仍受严格之限制,实行新移民法之目的,与一九五零年所实行之回马签证,依然一样……”^①这一法令对新加坡华人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与祖国的联系忽然间被斩断,加之东南亚地区排华浪潮此起彼伏,华侨华人的私人财产受到侵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此情此景都促使新加坡华人扭转侨民心态,致力于追求本地认同,积极追求在新加坡的政治权利,他们唯有取得当地公民权,或加入英籍,才能享受保护的公民权益^②。

四、结语

处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交汇的关键时间点上,新加坡对华侨华人政策的演变并不只是新加坡与中国大陆一对一的互动,而是在多方势力相互作用下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蕴含了英殖民者为维护殖民统治镇压马共的需要,为保障殖民经济利益,控制人力资源,维系锡胶业生产的考量,亦有东南亚各民族追求民族自尊、民族独立产生的排华浪潮影响,导致新加坡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限制。复杂的国际形势加上新加坡内部住房资源匮乏,使得外侨入境规模被新加坡当局有意识地加以控制。

多重因素下,新加坡当局对华侨华人出入境的限制更为严厉,中国大陆赴新移民也逐渐进入低潮。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下至个人,由于出入境政策的限制,华侨华人在新遭受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排挤,侨眷在中国境内亦受到某些政策的影响,双方虽处境艰难,却因政策限制不得相会,对双方身体与心灵都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而新加坡华侨华人亦因出入境政策的收缩,导致与祖国联系的纽带被切断,这一政策演变促进了新加坡华侨华人的政治觉醒,华人新的国家认同意识经过重塑,逐渐由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新加坡,推动了新加坡华侨社会的发展。

本文以宏观的历史国际局势变迁与微观的个体经历相结合,探讨了 1947—1953 年新加坡对华侨华人出入境政策演变的过程及造成其演变多层次原因,并总结该变化给新加坡华侨华人个体与新加坡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以期能够进一步推动对新加坡华侨华人问题的全面认识,厘清东南亚华侨华人历史的发展脉络。

(责任编辑:郑春玲)

Research on the Evolution of Entry and Exit Management Policies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apore (1947–1953)

Teng Yijiang

(Institute of Sino-Foreign Relation History, School of Art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510632)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suddenly faced a very severe reality of survival. Singaporean overseas Chinese Zheng Wuchang and his fiancée Cai Lixi, who stayed in their hometown, Chao'an, told their pain of not being able to meet each other in the context of policy contraction in their letters. From 1947 to 1953, under the rule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the Singapore authorities were increasingly stringent on the entry and exit control of overseas Chinese.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the British colonists' safeguarding of colonial interests, the influence of the wave of Chinese exclusion in Southeast Asia, suspicion and hostility towards new China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well as the shortage of housing resources in Singapore have jointly pushed forward the contraction of this policy,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overseas Chinese individuals and Singaporean society.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in Singapore; Immigration Policy; Chinese Immigration

①[新]《移民统制官赫斯华氏谈离马赴华手续》,《星洲日报》1953年8月9日,第5版。

②温广益主编:《“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